

古代通俗文学研究精粹丛书



二十载繁华梦

黄小配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窦永丽

二十载繁华梦

黄小佩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湖北路27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 10.75 印张 2 插页 231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330·9 定价：1.85元

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编 辑 说 明

近代文学，即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夕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在中国革命史上，它起过启蒙的作用；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它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的进步文学，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艺术传统，在题材、内容和文学形式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在内容上，它以反帝爱国和宣传民主主义革命为基本主题，自觉地使文学成为现实政治和社会批判的工具。或直接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密切配合维新运动；或鼓吹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宣传鼓动。在文学形式上，它突破旧有形式，语文合一，趋向通俗化和多样化。这些变革，形成当时的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

由于近代文学自觉地为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服务，因而要求文学必须注意不同层次的读者，力求通俗化。通俗化的要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采用白话文，文字浅显，易读易懂，形式自由，表达方便；一方面利用广大社会阶层所熟

悉的各种艺术形式。如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倡导“平易畅达的新文体”和“小说界革命”，并亲自写白话小说；著名革命家陈天华、秋瑾也利用通俗文学形式，或写白话小说，或写民间唱本；还有许多作者运用戏曲、话剧等形式。当时通俗文学呈现繁荣的景象，起到宣传变革、鼓舞士气、开通民智、激励人心的积极作用。

近代通俗文学面向广大社会群众，这个层次的文学，在近代启蒙运动中的进步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近四十年来，我们偏重于研究高层次的“正统”文学，而对近代通俗文学却很少研究或重视不够。

近代通俗文学包括白话小说、戏剧、民间故事、唱本、民歌，数量众多。以影响最广泛的白话小说而论，人们一般只谈到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其实名称可考者有近五百部，其中确有一些优秀和比较优秀之作。关于太平天国、义和团的民间故事和民歌，各种弹词唱本和地方戏曲脚本，也有一部分有价值的作品。对这些作品，我们过去注意不多，当代读者很少知道。由于时日长久，又经十年动乱，大部分材料散失，为了向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实际的作品资料，我们就目前接触到的资料，编选了这套《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这套资料以编选实际作品为主，附录有关史料，编选的原则是：

一、编选在旧民主主义各次运动中或在社会上有影响，

以及近代史上著名思想家或革命家的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品除了它们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还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具有史料价值。

二、编选重要作家的各种较好的作品，这样，除了已经流行的该作家的代表作，读者还能读到他的其他重要作品，有助于对这些作家的全面了解和研究。

三、编选的作品要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或艺术价值，内容比较健康，或写作上有某些可以借鉴之处，具有可读性。当然，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作品，看到作者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对它们内容上的错误和缺点要作必要的分析说明，对极个别描写“过黄”的语句作必要的删节；凡删节之处均作了标记。

四、有的作品，在建国后曾经印行，但经过三十年，读者已很难得到，而又确有研究价值的，当酌情编选。编选时将根据原本，重作校订。

五、每书卷首前言，包括作者介绍，版本和整理情况、内容评介。

囿于我们见闻不广，限于我们学力不足，编选未必得当，整理难免不妥，评价或有错误，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指正，以便改进。

《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选小组

一九八六年六月

前　　言

一

清末作家黄小配所著《廿载繁华梦》，不仅是作者本人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晚清一部著名的暴露封建专制制度罪恶和社会黑暗的长篇小说。

清代末年，中国文坛曾一度出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谴责小说”和新创的革命历史小说。对于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代表的“谴责小说”，鲁迅先生早就作过深刻而具有远见卓识的分析，他说：清王朝自嘉庆以后，尽管先后镇压了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回民等等的起义，但在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法战争及中日战争中，却接连不断地惨遭失败。这些无可否认的事实完全暴露了这个腐朽不堪的王朝已经完全失去了保卫自己国家的能力。于是“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致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

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中国小说史略》）从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角度阐明“谴责小说”当时之所以盛行的原因，鲁迅的话至今仍然是伟大的。“谴责小说”为时代母亲所孕育，并且很快蔚为大观，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值得书写一笔。但是，我们且不可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众多的“谴责小说”作家奋起抨击时政、显其弊恶的同时，一个历史的二律背反却悄悄地延伸到他们的脚下，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一个只配让丑恶去开垦的龌龊世界正在需要“武器批判”的时候，自己却从容不迫地选择了“批判的武器”。这不仅暴露出“谴责小说”作家们政治上的近视和思想上的偏狭，而且也由此造成小说艺术上的严重缺欠，“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于讽刺小说同论，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远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此同时，对于读者，这批“谴责小说”确实使革命的、爱国的以及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们看到了时代大变动前的征兆，也架通了早期革命家由“批判的武器”到运用“武器的批判”的桥梁。但是，过多地揭露丑恶和黑暗以及作者对黑暗和丑恶莫之奈何、安之若命的消极态度又助了另一个层次读者的妥协和无望心理，以致使这“连篇话柄”终不过“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引同上）这就是清末“谴责小说”的历史地位，也是我们今天对《廿载繁华梦》的概观评价。

二

黄小配，又名世仲，别号“禹山世次郎”，笔名“黄帝嫡裔”，又号“世界一个人”，广东番禺人。约生于一八七一年，年纪与梁启超相若，并同学于佛山书院。小配自幼少受礼教束缚，有离经叛道思想。尽管其祖父及父亲都是理学家，他本人却不为家学所羁，一意孤行，成为旧时代的“读坏书”人物，这为他以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个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弟，少年即陷于贫困，曾一度到广州谋生，后又到过南洋，先在马来西亚，后到新加坡。在新加坡从投稿到当记者，在著名文人邱菽园所办的《天南新报》供职一个时期。上世纪末，黄小配参加了孙中山老友尤列领导的中和堂。一九〇二年离开南洋回香港，加入陈少白创办的革命报纸《中国日报》当记者。一九〇三年初，他发表了一篇驳康有为的文章，于是黄小配其名便无人不知了。后来他与章太炎南北分据，用犀利、浩荡的文笔撰文共斥康有为“非排满论”，更是文名大震。一九〇五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他与陈少白、陈树人及郑贯公等一起加盟，从而成了早期革命派中的一员。同盟会在香港设立分会，由陈少白任会长，黄小配负责交际。实际上当时香港分会不但是西南各省党务军务的总机关，又是海外各地华侨进行联络的中枢，这样交际一职越发显得重要，因此黄氏这一时期在政治上是极为活跃的。

黄小配入《中国日报》一年后，又与老友郑贯公相继办

起两份革命报纸，一为《世界公益报》，一为《广东日报》。这两份报纸与《中国日报》一起在当时被称为著名的三大革命报刊。一九〇五年黄小配加入同盟会后，黄、郑二人再度合作，创办了《有所谓报》，又名《唯一趣报》。这个报纸形式极为灵活，虽多载文学作品，但又间参漫画，它不但长、短篇俱备，而且结合形势，大胆采用白话及粤语方言写作，大受读者欢迎。由于这份图文并重的报纸销路广且影响大，因此在革命宣传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黄氏的革命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就曾在该报上连载过。就在这一年，老搭档、好友郑贯山不幸歿世，黄氏失去了帮手，又加经费不足，《有所谓报》被迫停办。到了一九〇七年，黄氏又独自开办了《少年日报》，他的《洪秀全演义》继续在该报连载，至五十四回，该报停刊，小说未能续完。《少年日报》也得到当时读者的好评。

黄小配自一九〇五年加入同盟会后，不但用文字宣传革命，还作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他非凡的社会活动能力得到了显示。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前，他还参加了三月二十九日的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的一个多月，他在广州出版的《南越报》上，连载发表了题为《五日风声》的“近事小说”。这篇长达三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式作品，从一九一一年五月份起在报纸上连续刊登了五十七天。文章以简朴的语言、清晰的条理、浅近的文言句式，详尽而全面地叙述了黄花岗起义的始末，迅速而及时地把这一轰动世界的政治事件真象大白于世，起到了极好的宣传作用。

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成员执政，黄氏也担任了广东全省民团局长。由于和当时任广东省长、后来背叛了孙中山的陈炯明关系闹僵，陈去职广东时，以侵吞军饷罪控告黄小配，并假新任广东省长胡汉民之手，将其处以极刑。死时年仅四十二岁。噩耗一传出，世人纷纷为之不平，而且黄氏死后证明他确实并没有什么财产，侵吞军饷纯属诬陷，他的被杀成了一桩尽人皆知的大冤案。

黄小配是一个把小说当作民主革命斗争工具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大都是有所为而作，积极鼓吹革命，在海外华侨中影响极大。他一生创作的小说很多，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革命历史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洪秀全演义》。这部小说相继刊载于《有所谓报》和《少年日报》后，一九一四年上海锦章书局石印，题为《绣像洪秀全演义》。小说一直流传至今。此外，还有《陈开演义》，描述广东三合会首领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事迹，它是红巾军专题历史小说的创作。另一类是“谴责小说”，这类小说大都有相当的历史依据，同时又不乏作者的艺术虚构。它们是《廿载繁华梦》，写买办周东生的升沉历史；《宦海升沉录》（又名《袁世凯》）写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发迹史；《宦海潮》写外交红员张荫桓由市井无赖当上侍郎，升得高跌得惨的闹剧；《黄粱梦》写大官僚和珅的奢侈豪华生活。另外还有《大马扁》、《岑春煊》等数种。这些小说大都是揭露广东官场的黑暗实况和反动官僚罪行的写实作品，作者这类作品在其数量与质量上，一向被认为是和南海人吴趼人齐名的。此外还有我们

前面提到的“近事小说”《五日风声》，更是当时独步文坛的短篇力作，不特对当时而且对后世都有一定影响。

黄氏的一生是短暂的，而且细算起来他的创作时间还不到十年。但他在这短短的不到十年时间里创作了大量作品，其质量也属上乘，因此一向被人视为晚清文坛奇才。可惜只是过早地遭人暗算，这不能不说这是晚清文坛的一大损失。

三

《廿载繁华梦》约是黄小配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写于一九〇五年，曾在当时的《时事画报》上连续发表。一九〇七年汉口东亚印刷局刊行，第二年上海书局又出石印本。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有著录。

《廿载繁华梦》创作期间正值戊戌、庚子之后，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最严重的时期，《辛丑和约》的签订，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极为沉重的枷索。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后，日、俄帝国主义又展开了争夺我国辽东半岛租借权的战争，日、俄易手，中国人民陷入了更加艰难困苦的水深火热之中。在国内，清王朝虽然镇压了义和团起义，但全国人民反政府腐败，反外国侵略的斗争风起云涌。一九〇五年五月，全国性反美华工禁约爱国运动爆发，文艺界、新闻界成了这次运动的积极响应者和参加者。八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宣布成立，推选孙中山为总理，从此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走向高潮。至此，清王朝已经到了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境地。面对这种

风雨飘摇的严重局势，昏庸透顶的清统治者并未惊醒，依然不思图治，继续在瞒和骗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许多政府官僚所处心积虑的只是如何对国家进行瞞骗偷漏，如何对百姓进行侵吞渔蚀，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寻花问柳、携妓纳妾构成了没落官僚的全部生活内容。《廿载繁华梦》的创作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生活基础上的。因此尽管作者在书首及篇末题诗中通过阅览二十年人生之后流露出某种世途幻境、人生无常的复杂情绪，但透过书中以广东海关为视角，以海关库书周庸祐为骨干线索而展开的对封建王朝末世的淋漓尽致的描写，却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作者创作的真正意图，它尖锐、辛辣地批判了现实，无情地暴露了官场的龌龊黑暗，也较为生动地揭示出当时社会的一般情状。

《廿载繁华梦》所描写的内容与《官场现形记》相类，它写的是官场又不仅限于官场，描写范围虽涉及到北京及南洋等，但主要笔墨却在于华南。书中不仅写官场，也写商场及洋场，而且官场、商场并举，官场也就是商场。作者虽然在当时还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理解特定历史时期官与商这种契合无间的关系，但作为二者交通的媒介——银子，作者却本能地把它视为小说中几乎所有情节的连接线索。对于钱，书中虽然没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九死一生”那样令人首肯的正面分析，也没有卜士仁那种听后令人战栗的反面总结，但作者借梳佣六姐之口，睿智而凝重地总结成一句名言：“有钱能使鬼推车。”有了钱就有一切，没有钱就失去一切。曾几何时，周庸祐这个混世魔王就是因为挥霍完了

祖上留下的基业，才沦为无赖泼皮，直到发迹后还时不时被人当作话柄。傅成后半生的艰难遭际，周少西的吞毒自杀，哪个不是为了银子！就是北京城里皇帝眼皮子底下那些主宰国家命运的王公大臣们，也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嗜银子如命的家伙。靠着金钱，周庸祐运动京城王公，使能让自己得到大大好处的联元当上了广东海关监督；靠了金钱，他轻而易举地作了驻英使馆的高等参赞；同样靠了金钱，又使他这个“生平不甚念书，问起爱国安民的事业”“却分毫不懂”的无赖放出钦差，最后官至二品京堂。周庸祐繁华梦的最后破灭也多是因为金钱，如果他不是硬着头皮不肯答应金督的筹项，再多拿出十万八万银子，似乎还不至于狼狈到流落异国的地步。如此看来，作者敏锐地抓住“银子”这一文武兼备、伸缩自如的法宝，就把当时官场秘诀、世态真相统统掌握其中了。

《廿载繁华梦》带有某种传记性，贯穿小说始终、起骨干作用的、作者用力最勤的就是那个少年无赖周庸祐。这个人物形象是书中写得较成功的一个，他少年落拓，不甚念书，但对“弄功名、取富贵”却“有些手段”。一旦做海关库书的娘舅为他提供了一个发财的机会时，他便不顾一切地挤进了这个他渴望已久繁华之地。他立脚刚稳，第一步棋就是骗走了苦苦扶持自己的舅舅，诳了三万银子并夺到海关库书的肥缺，真是“资财一入奸雄手，姻娅都藏鬼蜮心。”从此他就抬脚踏上了通向荣华和罪恶的人生之途。周庸祐当上海关库书以后，全盘继承了前任串拾金价、随手开销、暗

移公款、发放收利的衣钵，而且手段更加灵活，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无所不为，不过几年竟成了广东屈指可数的巨富。偏房外室尚且不算，仅是他在广州的住宅，就把宝华正中约这样一条长街占了一大半，宅后花园、戏台，一应俱全。蓄妓纳妾动辄花去三五万，妻妾多达十几房，其生活的骄奢淫佚，实在骇人听闻。难怪他每次进京，京城的达官贵人竟象苍蝇逐臭一般纷纷找上门来，为了弄到三、五万银子，或撺掇活动一个外任优缺，谁个不巴结这位广东巨富！对于周庸祐其人，作者写了两件事最能见其真性：一件是书中第三回写到周庸祐为了在恭王爷手里谋上一官半职，就千方百计攀上了任满回京、与恭王爷有些瓜葛的海关监督晋祥。但回京途中，晋祥染病歿世，周庸祐乘机强占了晋祥的四十万家资，而且还将其美妾香屏据为己有。当妻邓氏斥其患难不救恩人，利其死却夺其资、据其妾，天理不容的时候，他竟大言不惭地拿古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话塞责。还有一件是小说第十四、十五回，写周庸祐捐了指省道员后想进京谋个官坐，为了打通宁王的关节，他不惜慷慨地一次奉上白银十万两，还顺便送上一位刚在半路买来、自己视若明珠的美女。由此两件，足见周庸祐这个衣冠禽兽的灵魂之肮脏、人格之低下，其下流无耻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除周庸祐之外，作者着力描写的另一个反面形象就是周的继室马秀兰。她生性刻薄，骄奢淫佚是她的生活准则。她撒泼耍赖而又长于心计，嫉妒偏狭而又善于应酬。她有潘金

莲式的粗爽，又有王熙凤式的细心。自私、狡诈、凶狠、嫉妒构成她性格的基本特征。实际上这个人物在书中是作为周庸祐性格的陪衬和补充而出现的。

书中正面形象出现的不多，值得一提的是周庸祐第一个明媒正娶的夫人邓氏。这位邓氏出身市廛，幽闲贞静，“素性不喜奢华”，仅此一条就注定了她在周家扮演悲剧角色的必然命运。朴素的道德观念、正直的良心，使她与衣冠禽兽周庸祐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裂痕不断加深。直到周庸祐占据香屏之后，这种冲突才达到了顶点，结果以邓氏的气极呕血致死而告终。事实上，杀死邓氏的凶手正是周庸祐。

作者在书中没有能够写出成功的、寄托理想和希望的正面形象，这与其说是现实给予作家的只有悲观和失望，莫如说作家只是用他那双失望的眼睛来看待现实。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黄小配，当时还不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现实，因此对未来也就没有明确的期望和理想。这一点我们在今天似不宜更多地苛求他。

四

《廿载繁华梦》在艺术上虽算不上特别成功之作，但它与同时代其他“谴责小说”相比，似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首先，从全书结构上来看，它既不同于《官场现形记》联缀官场话柄，汇为长编式的短篇汇集，也有别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说书人“我”为线索，把二十年目睹之事组成一个较连贯的长篇，而是以中心人物周庸祐为主线，围

绕他的二十年活动，描写他由落拓到发迹、再到被参抄家、株连亲友、甘载繁华及身而败、最终流落异地的全过程，从而组织成这近二十万字的“传记”式长篇。这样就使整部作品首尾连贯、描写集中，给人以完整之感。

其次，小说在描写上与同时代其他同题材小说也不甚相同，它不是以记事为主，专门掇拾官场丑闻、怪事，而是以写人为主、以力图描写成功的人物形象为目的，通过刻画人物，揭露政治黑暗，透示世态人情。在这一点上，似乎可以看到《金瓶梅》以及《红楼梦》对作者的某种影响。尽管书中主要人物形象描写的并不十分成功，作者的努力却是很明显的。从一定意义上讲，与同时代其他“谴责小说”相比，《甘载繁华梦》更应该是艺术的。

《甘载繁华梦》有自己的特点和成就，但全书的缺点也十分明显，这主要表现在：

一、缺乏变化发展的人物性格塑造。书中不管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其性格大都是停滞的、定型化的。尽管作者的爱憎感情比较分明，但终不能把这种感情动力运用到人物塑造上。我们往往看到，每每在人物描写的关节点上作者艺术才力缺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深度，降低了作品本身的价值。

二、大量堆积、不加剪裁的千篇一律的题材。如书中多次描写周庸祐蓄妓的情节，一般情况是，虽然前一次和后一次地点和人物有所变动，而情节的开始和结局几乎完全是相同的，有时叙述语言也相差无几，不免给人以沉闷、冗繁和

重複之感。

三、违反真实、不近情理的过份夸张描写。由于作者过份追求故事的离奇和偶然，因而许多情节在作品中显得突兀，缺乏真实感。比如书中主要人物周庸祐的行踪似乎就是这样，他时而在上海，时而在香港，一会儿回到广州，不知何时又到了新加玻。读后很容易让人想起《西游记》中的某些情节，缺乏足够的真实性。

(王长华)